

# 王怀远同志在辽宁省纪念抗战胜利 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代序）

发生在半个世纪前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一场保卫人类现代文明、反击法西斯侵略的正义战争。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获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也是中华民族从屈辱走向奋起的重要历史转折点。抗日战争的胜利，使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受到严重削弱，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统治基础受到动摇，中国共产党更加成熟，人民革命力量空前壮大，这一切都为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没有抗战的胜利，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来之不易的。为了赢得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我国人民承受了空前巨大的牺牲，军民伤亡共 3500 多万人，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总计达 6000 多亿美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长达 14 年之久。这里我特别要谈到的是，我们辽宁人民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爱国爱乡的楷模。“九·一八”事变发生在辽宁，抗日战争的第一枪，也是最先在辽宁大地上响起的。辽宁人民奋起抗战最早、坚持时间最长、斗争最艰苦。在辽宁的抗日疆场上，出现过杨靖宇、李兆麟、黄显声、唐聚五、李春润、邓铁梅、苗可秀、郑桂林等一大批民族英雄和抗日名将，在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也有闫宝航、高崇民、杜重远、车向忱

等一大批辽宁籍的杰出领导人。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将军，在总结失败的教训之后，毅然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在国民党系统中首倡联共抗日，发动“西安事变”，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促成全国抗战，建树了“千古功臣”的伟大业绩。总之，在这场战争中，我们辽宁人民作为爱国爱乡的英雄群体，为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做出了令我们后人引为自豪的重要贡献。

胡锦涛同志在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上指出：“只有对我们党‘昨天’和‘前天’的斗争有深切了解，才能做好‘今天’的繁重工作，勇敢地担当起‘明天’的历史重任。”对于我们党和国家“昨天”经历的这场抗日战争的重要历史和抗战胜利的伟大意义，我们的干部和群众是否有“深切了解”呢？我看相当多数是了解很不够的。不少青年人，包括我们很多跨世纪的领导干部，对这段历史知之甚少，甚至也不想知道。他们不了解这段历史，因而也就不知道当亡国奴是什么滋味；不了解丧失领土主权任人宰割的日子是如何令人不堪忍受，因而他们也就难于理解和想象我们的前辈为什么能够那样英勇为抗日而献身，为什么能够把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所以，我们要通过研究抗日战争史，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使我们的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和年轻干部深切了解中华民族由屈辱转向奋起的这段历史，深切了解落后就要挨打的真谛，从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树立起忧患意识，勿忘国耻，振兴中华。在党的领导下，万众一心，团结奋斗，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对我们辽宁人民来说更要铭记：抗战从这里开始，振兴辽宁，实现四化的重任，我们要自觉担起，自觉付出更大的努力。我想，这是我们研究抗战的历史，纪念抗战的胜利最重要的也是最现实的意义。

抗日战争是一座伟大的经验宝库，发掘这座宝库，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是当代史学工作者，特别是从事党史和抗日战争史研究工作的同志们的一项光荣职责。大家知道，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近百年中，中国对多次的外敌入侵每次均以失败告

终，一个个丧权辱国条约，一次次割地和赔款，蒙尽了耻辱。只有抗日战争是以中华民族的彻底胜利结束的，抗日战争的基本经验，对我们今天仍然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比如，抗日战争的基本经验之一，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这是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抗战期间，党的领导是最坚强的，党的领导也是最成功的。党的抗日救国的总方针和各项具体的方针政策代表了全民族的利益和要求，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抗战中得到了充分发挥和体现，党群军民之间始终保持密不可分的鱼水关系，许多感人故事至今令人难于忘怀。借鉴这一经验，今天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但要依靠和加强党的领导，更要搞好党的建设，改善党的领导，进一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今年我省在百年不遇的洪水面前之所以能够取得初步胜利，就是同党的坚强领导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分不开的，今后我们必须永远坚持这一条基本经验。

又如，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是抗日战争胜利的一条基本经验。从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到 1937 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期间，我们党从民族大义出发，为实现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今天，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也必须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使一切有爱心的炎黄子孙都能为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做出贡献。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发展和完善一系列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吸纳和团结海内外爱国人士，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包括为建设和振兴辽宁献计献策，招商引资，这条基本经验已经显示还将继续显示其强大威力，我们今后一定要继续坚持下去。

还有一条最重要的经验，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力量源泉。抗日战争的历史，堪称一部最生动、最丰富、最刻骨铭心的爱国主义教材。抗战中，广大军民的爱国感情和民族精神，得到了空前的弘扬和升华。抗日战争的胜利，就是伟大爱国主义

义精神的胜利，就是中华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胜利。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振兴辽宁，也必须增强对中华民族凝聚力和爱国精神传统的认识，从而增进人们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历程胜利前途和在振兴辽宁中应当如何有所作为的认识，这样我们才能做出无愧为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伟大业绩。

当然，抗日战争的基本经验还有一些。我想我们搞党史、革命史的同志，就是应当通过研究总结这些历史的经验，启发和教育今人增长知识，指导现实的改革建设和各项工作，推动我们的事业不断前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省的党史研究，包括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工作有了长足的进步，这是必须充分肯定的。十多年来，我省的党史各界出版了几百部著作和数以千计的论文，弄清了地方党史、东北抗战史上的许多疑难问题。这些研究成果已经和正在社会宣传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这次省委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的活动安排中，如出版纪念闫宝航文集、画册和抗日战争书刊，摄制历史纪录片《抗战从这里开始》，以及发表抗日战争的各类文章，举办抗日战争知识竞赛等，如果没有多年来党史研究成果的积累，是难以搞好这些宣传教育活动的。必须肯定，这些研究成果凝聚着广大党史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同时也是和各方面的关心和支持分不开的。例如省委老领导李荒同志对抗联史，宋黎同志对东北军史，郭峰、李涛同志对闫宝航、高崇民、黄显声等抗日救亡人物的研究工作的关心和指导，都倾注了不少心血。这次省委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的活动安排，虽然是以省委办公厅、省委宣传部、省委党史研究室三家名义上报省委批准的，但实际上许多工作是我们党史界和各有有关部门共同参与的，是各个方面大团结、大协作的结晶。在此我代表省委向大家表示感谢，向关心指导党史和抗战史研究工作的老同志表示敬意。也希望今后我省党史界和有关部門在省委领导下，进一步发挥各自优势，团结协作，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在充分肯定过去研究成果的同时，还应当看到我们已取得的成绩与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特别是我们的党史研究如何更贴近现实、如何使已取得的研究成果更快地转化为全社会的财富，充分发挥党史研究工作的资政、育人的作用，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学术研究是一项艰苦复杂的劳动，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广大民众的社会文化，也不是件轻松的事情，省委了解同志们的生活都很清苦，希望大家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无私奉献精神，以饱满的热情投入这项很有意义的事业中去，不骄不躁，再接再厉，努力取得更大成绩，为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1995 年 8 月 29 日

## 论抗日战争中的东北战场

李秉刚

抗日战争中的东北战场，大体经过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下的大规模群众性义勇军的抗战，和党独立领导的以抗日游击队、人民革命军、抗日联军为主体的抗战两大发展阶段。“九·一八”事变后首先兴起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曾发展到 30 多万人。在辽宁的北宁路（今京沈线）、南满路（今长大线）、安奉路（今沈丹线）、沈海路（沈阳至海龙）沿线、吉林的北部、东部地区和黑龙江省的嫩江、松花江流域，形成了广阔的抗日战场，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从 1933 年起，党独立领导的抗日武装逐渐发展壮大，到全国抗战爆发前，东北抗日联军已发展到 3 万余人，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强有力的抗日武装。这时的抗日战场，主要分布在辽宁、吉林的东部山区和黑龙江省东北部松花江下游地区。1942 年以后，东北抗日战争逐渐走向低潮，但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开辟最早，坚持时间最长，最艰苦。

东北战场的抗日斗争始于“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义勇军，除初期义勇军得到关内一些接济外，绝大多数时间东北抗联和其他抗日部队都是孤悬敌后，与关内其它抗日战场断绝联系。伪“满洲国”成立后，敌人逐步在东北各地建立起伪政权，实行法西斯统治。这时的东北战场已无前方后方之分，主要是在敌人统治相对

薄弱的地带 以山林为依托开展抗日斗争。由于东北交通发达 敌人机动力强，抗日军民虽然一度建立了若干块抗日游击根据地，成立了抗日政权和反日会等组织，但并未形成稳定的后方根据地。加上冬季气候寒冷等因素，因而东北的抗日斗争最艰苦，所付出的代价也最大。

第二，从总体上说，东北战场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 国民党实行了不抵抗政策 放弃了东北抗战的领导权。毋庸置疑 事变后 马占山、冯占海、李杜、唐聚五、苏炳文等将领率所部东北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并得到了张学良的支持。但是，在南京国民政府不抵抗的大前提下，这些抗日队伍不到一年时间便相继瓦解了。而中国共产党则派出大批党团员到义勇军中，相继组织了抗日游击队、人民革命军和抗日联军，从而肩负起了领导东北抗战的历史责任。正因为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才能坚持 14 年之久，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

第三 东北战场是中、朝、苏三国党、人民和军队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典范。

由于东北的地理和历史特点，“九·一八”事变后就形成了中朝两个民族共同抗日的局面。磐石、海龙、和龙、延吉等抗日游击队一开始就是由中朝两个民族的优秀分子所组成的；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曾是东北抗日联军的重要指挥员。从一定意义上说，东北抗日联军是中朝两国人民共同抗日的联合部队。东北抗日战争的后期 由于日寇残酷推行“匪民分离”政策 把抗日联军活动地区分散居住的农户赶进“集团部落”中 制造了大片的无人区 同时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实行“篦梳式”“踩踏式”的“讨伐”致使抗日联军急剧减员，面临空前严峻的困难。在此情况下，东北党组织决定转变策略，保存基干，以小股部队开展抗日游击活动，多数人员撤至苏联境内整训。苏联共产党和边境军民对此予以了热情的援助，从而保存了抗日联军的骨干力量。在战略反攻阶段，苏联红军进军

中国东北，为消灭日本关东军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四，东北人民的抗战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意志，推动了全国反日爱国运动的高潮。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予抵抗，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东北人民组织义勇军奋起抗日，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意志，也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反日爱国热情。具有反帝斗争光荣传统的北平、天津、上海等地的青年学生和工人、市民纷纷走上街头，要求政府出兵抗日，援助浴血奋战的东北义勇军。马占山领导黑龙江省军民江桥抗战的消息传出，关内各省市民众和旅居越南、新加坡、菲律宾、加拿大等国的华侨纷纷打电报给马占山部，赞扬该部“饮血前方，连败日寇，忠勇义烈，举国同钦”表示声援、慰问和捐助。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开始转变政治态度，要求国民党放弃其误国政策。在全国人民反日爱国怒潮日益高涨的情况下，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不得不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和行政院长职务，宣告下野。

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也激发了国民党部分将领的爱国热情，促进了国民党集团的分化。江桥战役发生后，国民党陆军第三、四、五师和新编第六师，国民政府警卫第一师等都发出电报表示声援。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则决定从全军中选出4,000人组成两个独立旅，命名“西南国民义勇军”，确定以张炎、翁照垣分任旅长，蔡廷锴任总指挥，并秘密购置了皮衣帽、皮手套等御寒用品，准备1932年正月底开赴东北抗日。正当该部积极准备北上之时，日本侵略军在上海发动了“一·二八”事变。蔡廷锴立即率领所部奋起抵抗，并坚持了一个多月，给敌人以重大杀伤。这与该部官兵在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推动之下，早就下定了抗日的决心是分不开的。

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对张学良思想的转变也发生了深刻的影响。马占山能率黑龙江省军民以劣势装备顽强抗敌半月之久，锦西

民众义勇能以土枪大刀歼灭古贺中佐所率骑兵部队，以及其他各地义勇军抗日杀敌捷报不断传来，大大增强了张学良的抗日心理。他曾多次接见抗日义勇军将领，勉励他们努力杀敌，并批准从东北军的装备中拨出部分武器弹药接济义勇军。其中 1932 年 10 月一次拨给辽南义勇军的弹药就达 20 多吨。

第五，东北人民的抗战，延缓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进程，从战略上配合了全国的抗日战争。

东北人民在长达 14 年的抗日战争中，前仆后继，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也给日本侵略者以极其沉重的打击，消灭了敌人大批有生力量。据伪《盛京时报》1933 年 10 月 3 日披露“九·一八”事变后的一年中 关东军战死将校 99 名、准士官以下 1,750 名 负伤将校 243 名、准士官以下 4,819 名 总计死伤 6,911 名。另据日本陆军省 1936 年 3 月 18 日公布的数字 从“九·一八”事变到 1935 年底 关东军战死者 4,200 人 伤病者 171,300 人，加上关东军参谋部统计的 1936 年到 1937 年 9 月的伤亡数字“九·一八”事变后的 6 年中 关东军在东北战死、伤病者共达 178,200 人。这个数字相当于“九·一八”事变时在东北日本关东军总数的 8 倍！而日军公布的数字 往往是被有意缩小了的 并且 以上还不包括 1937 年 9 月以后的伤亡数字。但据此也足以说明，在东北抗日军民的打击下，日本侵略者的损失是多么惨重！

东北军民在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同时，更牵制了大批日军，从而延缓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进程。在抗日斗争中，东北抗日武装频繁袭击日伪盘踞的城镇据点，破袭敌人的铁路、公路和通讯设施 扰得敌人不得安宁。日伪军不得不抽调大批兵力“讨伐”抗日军。据日伪资料记载，1936 年用于第三期“讨伐”的关东军主力部队就有：步兵第一、九、十二师团约 45,000 人，独立混成旅团约 6,000 人，第一至第五独立守备队约 25,000 人，骑兵集团第三联队约 3,800 人 电讯大队约 600 人，总计投入兵力达 8 万余人。这些还不包括配合作战的宪兵和铁道、航空、汽车队、江防舰队等特殊兵

种以及大量伪军部队。1937年至1938年，日伪军用于对松花江下游的三江地区的大“讨伐”出动兵力不少于5万人；1939年开始的对东南满地区的大“讨伐”又出动了日伪军6万余人，而当时活动在该地区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二路军不足4千人。敌人以绝对优势兵力，利用冬季树木落叶、大雪封山等自然条件，天上有飞机侦察，地面有大部队“篦梳式”、“踩踏式”搜索，确实给东北抗日联军带来了极大困难，但同时也牵制了日伪大批兵力。“九·一八”事变时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仅有1个师团、6个独立守备队共2万多人，到1936年已增至5个师团、2个混成旅团、3个骑兵师团和5个独立守备队共10万余人。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日军侵入关内的进程，从战略上配合了全国的抗日战争。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游击战争在战略上的伟大的配合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全国抗战爆发后，东三省的游击战争，配合的意义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分力量。至其给予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第六，东北人民的抗战，为中国共产党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和领导关内人民的抗日斗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这对于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全国抗战的局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党领导的东北人民的抗战，为这一方针的酝酿与提出，提供了重要的经验。

“九·一八”事变后，以罗登贤为书记的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东北已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实际，把抗日作为主要任务，派出大批党团员到义勇军中，推动了抗日斗争的开展。然而，当时党中央正处在“左”的错误统治之下。1932年6月中央召开的“北方会议”批判了所谓“北方特殊论”，撤消了罗登贤同志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职务。其后，满洲省委按北方会议精神组织建立红军游击

队，搞土地革命，结果孤立了自己，丧失了团结和领导大批抗日义勇军的时机。党领导东北抗日斗争生动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引起了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关注。在事实面前，一些持“左”的指导思想的同志在对东北的形势与任务的认识上也发生了转变。他们在详细听取和研究了东北同志汇报的基础上，于 1933 年 1 月 26 日发出了给东北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指示信，提出了在东北要“尽可能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的方针。此后又于 1935 年发出“六三”指示信，提出不仅在下层而且要在上层实行统一战线，使东北的抗日斗争重新获得了大发展。接着，中共代表团又以中央名义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实行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由此可见，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为党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基础。

此外，党在领导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过程中，对于如何对待伪军、如何对待敌伪政权、如何战胜敌人的“讨伐”等抗战中的基本问题，也积累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经验。这些经验，通过先后经苏联抵达延安的李延禄、李范五等同志认真总结，形成了中共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关于《东北抗日斗争的经验教训的点滴》共 7 章 10 万余字。其中有些经验例如“利用下层两面派政权”使其“表面应付日本暗中联合我军”争取伪军“将伪军拖出加入抗日军”或“仍藏在伪军内，到相当时机将这部分力量拿出来应用”，以及如何在工人、农民中开展群众工作等等，对于党领导关内的抗日斗争，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在延安的东北抗联负责同志还在抗大举办了一个百余人的东北干部训练队，传播东北抗战的经验，既为全国抗战增加了有生力量，又为其后收复东北准备了干部。

第七，东北人民的抗战，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5 年 8 月 9 日，百万苏联红军进军中国东北，打响了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东北抗日联军在战前准备和作战行动过程中，作了大量工作，为消灭日本法西斯作出了重要贡献。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为了防止苏联的进攻，在中苏边界各战略要地修筑了大量“堡垒区”有的宽 100 余公里、纵深 45 公里。在堡垒区内各种火力点、炮兵阵地、反坦克壕和掩体、地道等纵横交错。很显然，摸清敌人的这些防御设施，对于最终消灭日本关东军是至关重要的。然而，限于当时的侦察手段，靠苏军自身完成这些侦察是不可能的。而东北抗联官兵熟悉家乡的山山水水，具备搞好侦察的基本条件。因此从 1941 年起越境进入苏联的部分抗联人员经过严格训练，便开始了对东北日军设施的战略侦察工作。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基本摸清了敌人各堡垒区内防御工事的位置、结构、坚固程度、火力配备以及敌人数量等情况并进行了拍照或绘制成图。在这个过程中，不知有多少抗联侦察人员付出了生命。上述这些情报经过苏军整理印刷，进军东北时指挥人员人手一册。毫无疑问，这一本本凝聚着无数抗联人员汗水与鲜血的小册子，对于减少苏军的伤亡，加速日本关东军的灭亡，发挥了无可估量的作用。

除了战略侦察外，在苏军进军东北的过程中，还有部分抗联官兵或随军做向导，或乘苏军飞机跳伞降落到指定地点，随时用电台向苏军报告日军动向，以及潜伏在各地的抗联人员闻风而动，就近就地发动群众、组织武装袭击败逃的日军等等都为最终消灭日本关东军作出了贡献。

东北抗联人员在配合苏军反攻东北的过程中，出于战胜日本侵略者和巩固抗战胜利成果的需要，抗联指挥员一般都担任各收复城市的驻军副司令，直接参与接管城市、维持地方治安等任务。这样，东北抗日联军就在东北从哈尔滨到大连的 50 多座城市中站住了脚，用缴获的日军武器装备了自己，并恢复了共产党组织，建立了人民政权。这对于党中央下决心将工作重心转向东北，以及关内我军迅速挺进东北，使东北成为全国解放战争的后方基地，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作者单位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

## 论东北抗联与远东军的合作及其结局

阎福君 高树桥

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直接创建和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以下简称“抗联”）在坚持东北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曾经同苏联远东军建立了地区性的军事合作。这种军事合作，对于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东北起了重要的作用。

### 一、抗联与远东军合作的前提与条件

孤军奋战的东北抗联很早就希望得到远东军的协助。但 1939 年以前，苏联远东军对抗联的态度是冷淡的。

抗联很早就同苏联远东军建立了联系。但双方最初的关系，仅仅限于东北党组织或抗联个别人出入中苏边境。当时北满党组织和赵尚志急切想找到中共代表团弄清情况，申明意见。并先后两次于 1935 年、1936 年在远东军的协助下，派人过境赴莫斯科。以后，由于中共满洲省委被撤销，东北各省委和抗联部队负责人周保中等同志为寻找失去的中央关系也曾进入苏境。1939 年以前，抗联同远东军的关系十分有限。他们往往以很高热情希望得到远东军的帮助，尽快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然而，远东军对抗联的需要采取消极态度，并加以多方面的限制。1938 年 1 月，赵尚志率戴洪宾、祁志中各部在萝北一带作战失利，为求得远东军支援和寻找中央关系，赵尚志不得不率队退入苏境。当时远东军把赵尚志扣押起来，把其所率千余人队伍解除武装，人员遣往新疆。

远东军希望同抗联合作是在 1940 年初以后。由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变化，远东军对抗联由原来较为冷漠的态度，转而成为热情和期望合作，并采取了一些实际步骤。1938 年和 1939 年，日军在边界连续制造挑衅事件，即所谓哈桑湖事件与诺门坎事件。同时由于德国已于 1939 年夏开始进攻波兰，西方战线形势吃紧。苏联为避免两面作战，需要同战斗在中国抗日战场上的东北抗日联军的协同与合作，以稳定东方战线。他们因此把关押一年多的赵尚志、戴洪宾等抗联领导人释放出来并派回东北，希望他们在东北加强抗日游击活动，以牵制日军。而活跃在乌苏里江西岸的抗联第七军也开始得到远东军的少量武器弹药的援助。

在困境中的东北抗日联军也希望得到远东军的热情支援，解决问题，摆脱困境。当 1939 年底中共北满省委负责人之一冯仲云去远东军表达这个意见时，远东军表示，他们对抗联将“有专人负责，一切均不能和往日一样了。政治的、组织的、军事的决定以最大努力来帮助，唯一的条件是统一”。

抗联在远东军的帮助下，顺利地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对远东军方面提出的合作原则，理所当然地受到抗联领导人的反对。1940 年初，东北抗联各省委负责人李兆麟、周保中应远东军之约到达远东之后，在远东军帮助下，顺利通过了《吉东北满党内斗争问题的讨论总结提纲》以及《关于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新提纲草案》两个文件。第一个文件对吉东、北满两省委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总结，提出并解决了赵尚志的问题，决定把赵尚志调到第三路军任副总指挥。第二个文件确定了抗联与远东军的合作关系，规定了远东军对抗联临时的指导，即抗联为远东军提供必要的日军情报。同时决定抗联根据新的斗争形势对部队进行缩编。之后远东军方面又提出一个东北抗日游击队组织应与中共分开的提案，其意图就是取消中共对抗联的领导。对此，抗联领导人表示了明确的态度。周保中说：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武装力量，二者不能分开。无论何时，都必须保持我们东北抗日联军的整

个性。东北抗联同远东军合作的前提条件是保持东北抗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原则问题。远东军的这个意图不能不受到抗联领导人的抵制与批评。但对于急需与抗联合作的远东军来说，当时还是愿意遵守这个原则的。最后，双方商定建立苏联边疆党、远东军对抗联的合作关系。

## 二、抗联与远东军合作的目的是为更好地在东北坚持抗日

抗联与远东军的合作是有限的。远东军方面给予抗联的支援，一般只限于电台、电池、货币，或少量收容因作战负伤而过境的伤员。抗联部队所面临的严重敌情和困难局面，并未因与远东军的合作而有所改变。

抗联领导人为改变在东北开展游击活动的处境问题，曾经考虑过扩大远东军这个“外部条件”的支援问题。他们认为，“根据1938年冬季的斗争教训和日后国际情形，今年冬季（1940年——编者）若无最有利的外部支援，那么情形的严重性和失败的可能，是我们事先估计到的”。

但是，抗联对于同远东军的进一步合作问题根本没有提到议程上来，甚至对于抗联人员出入中苏边界问题，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状态，并建立严格的纪律。为消除随意过境所引起的各方面不良影响，抗联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等领导人不止一次地提请远东军方面加以注意，建议他们对过境的抗联人员“明确规定原则办法”。凡未经组织批准随意过境的，无论何种理由，都会受到严厉处分。

东北抗联的游击战争，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漫长而寒冷的冬天。抗联指挥员曾经酝酿过在冬季过境进入远东整训，到第2年返回东北的想法。第7军于1939年冬遭到日伪军重兵围攻追击，7军不得不化整为零，与敌周旋。彭施鲁率一队经奔袭转进，终未能摆脱追击，最后在粮食断绝3天之后，不得不率队进入远东以求保存余部。事后，彭施鲁受到处分。他在检讨自己的错误时仍是建议

周保中等领导同志应根据实际情况，考虑进入远东休整，抗联游击队“避免在冬季作无谓牺牲问题”。周保中仍然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他因此不能做出冬季过境的决定。

当时，抗联领导人最担心的则是部队因为有了同远东军的密切关系而造成较多过境的倾向，从而动摇了坚持游击斗争的决心。因此，他们一再重申“要尽量避免造成一种队伍不得不过境的条件。”

1940年抗联各部的抗日游击战争虽然取得某些进展，但并没有避免严重的牺牲与损失，抗联总人数继续减少。这时抗联领导人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他们一方面提出“为实力的保存”，“在极不利的情况下设法保存残余势力以图再起”另一方面仍然要求部队“要死守东北”，应以最后对抗日斗争之决心的行动”。他们仍然把任何形式的过境都看成是“放弃自己的阵地”的不可容忍的行为。当第3路军政委冯仲云根据抗联可能面临的困难形势，认为“吉东、北满的游击斗争已难以坚持下去了”进而对东北游击区域的分布问题提出一个提案，即“应当把吉东、南满现有的抗联部队转移到北满坚持斗争，同时便于集中力量同关内八路军打通关系”。但提案一提出就立即遭到吉东、北满省委的反对，并严厉地批评了冯仲云同志的提案是“取消了全满游击运动”，他因此也受到组织处罚。

### 三、滞留远东进行野营整训不是抗联领导人的本意

当抗联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困难的时候，领导人曾经考虑过抗联“是否继续斗争用什么具体的方法来继续斗争”这些重大问题。但他们对这些重大问题，还是寄希望中共中央的指示并做出决策，而不是依靠同远东军的合作来解决。因此，他们多次呼吁远东军协助寻找中共中央关系。他们曾经请远东军允许他们“派重要机关及代表”，经过伊尔库茨克转到新疆省向陕西、延安中共中央所在

地去”。没有中共中央的指示，他们必将恪守“坚守阵地”原则而决不动摇。

1940年秋，抗联领导干部周保中、赵尚志、李兆麟、冯仲云、王效明等及其所率部队齐聚远东。远东军事先通知他们说，中共中央代表将到达远东。所有的抗联领导干部都把这次通知当做特大喜讯，所以他们于这年底先后率领所属部队到达远东。然而他们在这里并没有等到中共中央代表到达。12月中旬，远东军方面才肯定地答复说中共中央代表不能来远东了。这消息使抗联领导干部大失所望，他们对远东军原来通知的真实性产生怀疑。

在得到中共中央代表不来参加会议消息的情况下，抗联领导干部们对远东军提出的许多不切实际的建议不能接受。远东军方面曾提出抗联的领导关系问题，建议抗联应归联共领导，并提出了一个《关于党的工作和党的领导组织问题》一文，要求抗联领导周保中、李兆麟给予肯定答复。周、李在12月20日给远东军联络员王新林的信中表示不能接受远东军的建议。他们坚持认为，关于抗联和东北游击运动，应由中共中央和远东军共同规定新的方针。没有中共中央代表参加，他们也不接受远东军决定召开抗联领导干部会议的建议。

抗联领导干部认为，东北游击运动，不论其现在情势如何，它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不可分离的部分。党组织领导的游击运动，必须由党组织决定。抗联在1940年同远东军建立关系，接受远东军的直接领导，属于临时的特殊的性质。所以，远东军建议召开的这次会议，是中共党组织代表会，而不是别的什么会议。所以，他们对后来远东军方面提出的由远东军方面“公开担任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直接指挥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建议，被抗联领导干部称为“头朝下走路”而加以拒绝。

关于由远东军担任抗联总司令问题，后来由于共产国际的干预及远东军司令易人得到解决，新任远东军司令同抗联联络员王新林宣布完全同意周保中同志意见，他代表边疆党和远东军对